

文史博览

本地特稿

史话

两千年前的古人,如何随身带笔?



“白马作”是一支毛笔,如果要把毛笔“藏”在身上,如何优雅又方便?看看两千年前的古人怎么做。

毛笔当发簪 古人的时尚有点酷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喜欢在上衣口袋插一支钢笔,看起来儒雅,用起来方便。其实,古时候的文人,早就掌握了这种时尚精髓,他们把毛笔簪在头上,既解决了无处放笔的问题,又能做到随取随用。仔细看就会发现,“白马作”毛笔的笔杆尾端有一个钝尖,据说,这是为了方便把笔杆插进发髻里。这支毛笔出土时,在墓主人头部左侧的位置,因此研究人员推测,在墓主人入殓时,这支毛笔就簪在他的头发上,这也证实了汉代文官的“簪笔”习俗。

时尚仿佛是个循环

目前最早的关于簪笔的记载,出现在《史记·滑稽列传》中,“西门豹簪笔矜折,向河立待良久”说的就是它。除了文字记载还有“照片”为证,山东沂南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一位官吏双膝下跪双手捧捧案牍,耳旁便插着一支毛笔。后来,簪发的毛笔从“洗干净也能用”变成“没蘸过墨的白笔”,这种时尚也就正式变成一种“身份符号”,被称为“簪白笔”。

这支毛笔自带“署名”——“白马”

“白马作”毛笔通长23.5厘米,正是汉代长度单位的一尺,与《论衡》所谓“一尺之笔”相吻合。说明当时的毛笔制作已经有了成熟严格的规范,而且它也具备古人对手一支好毛笔的要求:尖、齐、圆、健,即所谓“笔之四德”,适合在竹、木质地的简牍上书写。除了笔杆尾端略尖,这支毛笔与现在的毛笔相差并不大,浅褐色的竹制笔杆中下部刻隶书“白马作”三个字。刀法工整整齐,因为汉代保留着工匠实名制传统,所以研究人员认为,“白马”就是制作这支毛笔的工匠的署名。经过两千多年的时间,这支毛笔依然保存完整,被认为是我国汉代毛笔的代表作。两千年前,这支“白马作”毛笔记录了历史。如今,这支毛笔本身成了一段历史。

本文来源:“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

农民领袖罗转瑞

罗平

罗转瑞生于清同治三年(1864),籍贯为攸县大同桥罗家潭(后撤乡并镇,大同桥镇划归为新市镇)。16岁那年,因家穷,罗转瑞被过继给今观东村李家塅王一、王二兄弟为子。罗转瑞到李家塅不到几年时间,他家仅有的12亩水田被地方财主强占。从此,罗转瑞一家只好靠打短工营生。

开仓放粮

1917年春,农民为度春荒,要求当地积谷仓放粮。开仓放粮事务由富户何章虎、谭品玉两人把持,他们利用这一时机,盘剥贫苦农民,荒月借出一担谷,到收割时要收一担二桶。农民明知是乘人之危,但敢怒不敢言。罗转瑞见此情景,组织颜少二、颜学成六等6人出面,向何章虎、谭品玉提出借谷减息的要求,遭到拒绝。不久,罗转瑞要租通文墨的颜少二执笔,一晚上写了数百张标语贴在农舍墙壁上,揭露何、谭二人用积谷招徕谋利的罪恶。有些标语写着:“何家有个何章虎,吃鱼胆不见苦”“谭家有个谭品玉,吃过人肉无人救”等。标语张贴后,一些有正义感的绅士也帮农民说话,何、谭只得让步,积谷由原来的二桶减为一桶,并将积谷仓一分为二,更方便了农民。这一场斗争以罗转瑞为首的农民

领导协会

1926年,北伐军攻克攸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在攸县风起云涌,农民协会相继成立。罗转瑞牵头成立三区安都乡农民协会,担任执行委员,他的战友谭连生任秘书,农协发展到4000多人。他组织农协会会员先后到谭少河、谭品玉等9名富户家抄家,抓他们游街示众。此时三区农协的领导权被阶级异己分子丁大四所把持,他收取贿赂,包庇豪绅地主。罗转瑞坚决支持县农协筹备处将其逮捕,自己担任改组后的三区农协委员长。他和县农运特派员,共产党员王者互相配合,使三区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正当工农运动如火如荼之际,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攸县反动武装头目罗定也从湘西窜回攸县,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罗转瑞被迫逃离攸县,在醴陵躲避一年多时间才回家。回家的第二天,罗转瑞就被抓,押送到钟佳桥挨户团主任艾瑞虎私设的牢狱内,豪绅们准备第二天处决罗转瑞,甚至连杀人的刀都已磨好。

好靠打短工营生。他身材高大,有一身好武艺,为人正直,常常为穷苦农民打抱不平,深受民众爱戴。他常骂财主富户是“吸血鬼”“害人虫”。他有一点文化,又做一点生意,略见世面。“五四”运动爆发后,受新思想新文化影响,他决心团结组织农民群众,与地方豪强作斗争。

打抱不平

取得了胜利,在十里八乡享有很高的威望。但从此被官家豪绅视为眼中钉。不久,地方豪绅找借口,将罗转瑞、颜少二、颜学成、罗洋六、吴菊七、吴蒲九、谭连生7人抓捕,押送去坐牢。得知这一消息,安都乡农民怒不可遏,当晚全乡有1000多人手持大刀、鸟铳、耙头、木棍赶到钟佳桥,将7位农民领入救出。此后,罗转瑞又先后两次发动农民斗争,迫使当权者将积谷利息由一桶减为二升。

1922年八月十五日,土豪谭少河无故打伤长工,长工欲诉无门。得知这一情况,罗转瑞组织了上100人的队伍,浩浩荡荡来到谭少河家,二话不说冲进猪栏赶出两头肥猪杀了,并上楼下下7箩糯米,在谭家坪里用大锅煮饭,这在当时叫“吃大户”,吓得谭少河连连赔礼道歉,并答应支付受伤长工医药费。

历经磨砺

听说罗转瑞被抓,周围十里八乡的群众2000多人自发赶到钟佳桥要求释放罗转瑞,并凑了20块大洋送给挨户团团长安守章。守成章顺水推舟,将罗转瑞押送至攸县县城。罗定知道抓了罗转瑞,自然要置罗于死地。大同桥1000多名男女老少连夜举着火把进城,请当地绅士文香教(其女婿何高再在罗定手下任职)一道到县城说情,罗定在无奈之下将罗转瑞判处两年有期徒刑。服刑期间,每隔一、两天就有群众来探监慰问,使狱卒惊论不已,因而不敢迫害罗转瑞。刑满出狱后,罗转瑞仍宝刀未老,斗志未泯。1929年六月,长工罗一仔被主家谭子文打伤,罗转瑞又组织民众将谭子文10多亩早稻收割,一部分给罗一仔疗伤,大部分分给农民。

罗转瑞过七秩、八秩寿辰,家里很穷,请不起客,四乡群众自发带着礼物、酒饭为他祝寿。1948年,罗转瑞以85岁高龄辞世。

古代军人俸禄的那些事儿

张李军 付玮

中国古代军人的酬劳称为俸禄。军人俸禄制度建立前,统治者对军人普遍采取赏赐的办法。具有完全意义的军人赏赐,始于夏王朝。夏王朝制定了赏罚制度,有功者受赏,不服从者遭罚,即所谓“师出以律”。

到西周,军队的阶级构成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在军人待遇上,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现象,即统帅将领尤其是高级将领的待遇有较大提高,而广大士兵的待遇却没有明显改善。

春秋战国时期,文武逐渐殊途,“兵农合一”与常备军并存。各国对武官的报酬,一般不再采取赏赐采邑的方式,而是采用了支付俸禄的做法。俸禄以谷物为主,计量单位因度量衡不同而有别,秦、燕、卫、楚国用“石”“斗”“盆”“担”计算,齐国和三晋的韩、赵、魏国用“钟”来计量。秦王朝建立之后,实施了与军爵制相适应的官俸制度。军队官员的俸禄与军爵等级相联系,用粮食来支給。

到了汉代,官秩大小和俸禄标准,由国家按月支付月俸。西汉初期沿用秦代谷物俸制,最高的(大将军、骠骑将军等)秩万石,每月实得350斛,最低的秩比二百石,每月实得27斛,最高为最低的13倍。大约武帝之后,官吏的俸禄有时或发铜钱,称为俸钱,据史料记载,当时大司马、大将军俸钱每月六万。东汉官秩俸钱等级与标准基本同西汉,只是“凡诸受奉,皆半钱半谷”。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军官的俸禄主要承汉制,俸禄标准不稳定,也不完全一致,俸禄的多少,与国家或所领地区财政收入的厚薄紧密相连。由于连年混战,军费开支巨大,加之物价不断上涨,这一时期各国对军官的俸禄普遍采取实物形态,如魏多采汉制以粟为禄,蜀、吴则采取布帛等形式支付;两晋时期,

西晋以谷、绢、田和力役等作为俸禄;南北朝时期,对官员的俸禄多以谷、布绢等实物实现,按岁或季制定标准发给。

隋唐五代时期,隋朝官分九品,武职官员三至九品,按品级给俸,并区分京官和外官,俸禄标准有所不同。唐朝官分30等、禄分18级,武官俸禄由禄米、月俸、职田受益三部分构成,如最高武官、正三品的兵部尚书岁俸禄400石,有职分田9顷,另有月俸钱17000。

元朝官秩俸禄支付方式一是俸钞,二是俸米。虽然元朝军人俸禄仍然采取的是实物和货币相结合的混合形保障(俸钱是货币,俸米是实物),但和金朝相比,元朝军人俸禄的实物部分明显减少,货币部分比重增大。

明朝武官俸禄规定有两种情况:一是有功者按品位的高低决定年俸的数额;二是无勋之武官按官阶的高低决定年俸的数额。明朝武官的俸禄档次分明,等级差别比较大。正一品武官的禄米为从九品武官的17倍,俸钞为10倍。

清军入关之前,八旗将士没有俸钱,其合法收入主要靠领取赏赐、计丁投田和按职论功免除丁赋等方面获取。直到顺治时期,清朝才正式建立了军队的俸饷制度。其中,“俸”是指国家财政发给武官的薪金,即俸银、俸米;“饷”是指士兵的饱饭、大米。清朝武官的俸按品级支給,包括正俸、恩俸、养俸、补贴等项目。

从元朝开始,纸币成为军人俸禄支付的一种方式。元朝时期先后发行了中统钞、至元钞、至大钞和至正钞,明、清时期军人俸禄也支付过纸币,使得纸币成为军人俸禄和军人消费支付的重要手段。这一重大变化,在中国军人俸禄制度史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来源:《军队财务》杂志

时事·聚焦

责任编辑/美术编辑:刘珠星

中原迷笛音乐节大量物品被偷

组委会:落实窃案65起,追回部分财物

“要重新打一个翻身仗” 明年还在南阳办迷笛音乐节

连日来,“中原迷笛音乐节露营地财物失窃”的消息持续引发关注。

10月5日,迷笛音乐节官方发布公告,10月4日上午因网传陈某某(已被抓获)违规发布“活动已结束要清理现场”的不实信息,引发附近村民趁乱下手,出现多起露营地财物被盗的案件。截至目前,当地警方共接到报案73起,落实被盗窃案65起。经过公安机关的积极侦办,现已抓获拘留了一些盗窃者,追回部分财物(在目前公安所接到的报警中没有发现个别网民所传的丢失几十万财物的情况)。南阳市区两级政府也会联合迷笛方尽力挽回歌迷的损失。

中原迷笛音乐节组委会成员范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偷盗事件总共丢失财物预计有几十件,此前网传电缆被盗、20余万元被盗均为谣言。回顾本次事件,他认为,因天气比较恶劣,安保人员和各方人员比较松懈;部分村民对捡拾物品的界限也存在误区。未来,迷笛音乐节会加强提醒,将采取更多改进措施。



中原迷笛音乐节现场。图据迷笛主办方

总共丢失财物预计几十件 “这件事是一个深刻的警示”

据范先生回忆,本次中原迷笛音乐节露营地约有2万人,占地6万平方米,有100余名安保工作人员,部分露营地设有监控,10月3日上午,开始有歌迷在露营地现场反映财物被盗情况。记者注意到,迷笛官方微信信号曾发布露营地登记报名表,报名表提及,音乐节期间如有丢失物品,请及时到服务处登记,并关注迷笛官方告示。

“(音乐节期间进入露营地)需要安检,必须持有我们的手环才能进入,但是(事发时)露营地已经关闭了。3日中午12点,我们所有的露营地相当于结束了,要求他们收拾东西、离开露营地。”范先生称,由于露营地关闭,许多歌迷开始收拾撤场,工作人员未能识别混杂其中的偷盗者。范先生介绍,偷盗事件总共丢失财物预计有几十件,此前网

传电缆被盗、20余万元被盗均为谣言。在偷盗事件发生后,迷笛方主要进行两方面工作,一方面,配合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取证,整理反馈歌迷拍摄的偷盗相关照片、视频,帮助形成证据链;另一方面,核实找回的遗失物品归属,根据此前遗失物品登记表等,完成遗失物品认领,将在后续寄回,他们在南阳感受到的热情,比如不少南阳市民自发免费接送歌迷、免费送矿泉水等。

范先生表示,“这件事对我们是一个深刻的警示,也是迷笛音乐节做大、做强、做得更好必须要经历的阵痛。”回顾本次事件,范先生认为,因天气比较恶劣,多日为雨天,安保人员和各方人员比较松懈,部分村民对捡拾物品的界限也存在误区,未来,迷笛音乐节会加强提醒,更多具体改进措施暂时还未确定。

针对10月5日公告中最后一段言辞较为激烈的内容,网络上出现了

不少争议。范先生对“地域黑”再次表达谴责,并称目前文字仍未做修改。“不存在我要遮遮掩掩,错就是错,偷东西就要负责任,可能你觉得这不是偷,只是捡,但我要告诉你什么是捡、什么是偷。”

5日晚间,中原迷笛音乐节卧龙区指挥部发布通告称,“已归还身份证79张、电脑3台、手机17部,其余物品正在核实联系……对确实无法追回的损失,经核实后我们将予以弥补。”另外,持音乐节购票信息的歌迷一年内还可以免费游览当地两个景点。

10月4日,本次中原迷笛音乐节发起人张帆曾接受《南阳日报》采访,称明年仍在南阳举办中原迷笛音乐节。对此,范先生称:“我们不能一件事前面做得很好,最后(因为)一部分人把整个全部推翻,我们对这件(偷盗)事件表示遗憾,但未来还得做得好,还得面对这样的环境,让风气得到更多的改善,要重新打一个翻身仗。”

评论

“秋裤都被偷”的音乐节后 南阳该如何让人“三顾”

黄静

谁能想到,这次把南阳送上热搜的,不是音乐节而是“偷东西”。

10月3日,当人们还沉浸在15万人次乐迷在南阳“青春盛宴”里狂欢的上头新闻里时,却传来了“上个厕所就被偷了”的下头消息。刚点燃了一把火,就被泼了一盆水,这真是给南阳出了道难题。

其实在几天前的新闻里,南阳迷笛音乐节就有诸多让人感动的瞬间,比如多人将轮椅小伙高高举起,共享快乐瞬间,既摇滚又浪漫。这次音乐节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创下迷笛30年47届音乐节的最高票房纪录,现场观众人数也打破历届迷笛音乐节最高纪录。

然而随着偷盗新闻不断推送,那些让人愉悦的场面失了颜色,剩下的是不可思议和难以置信。一条视频显示,一个年轻女孩站在帐篷门口,大喊“谁把我琴偷了”;还有人表示上个厕所的功夫,帐篷、鞋子,甚至秋裤、内裤都不见了。而根据一个公益组织发起的微信接龙信息,3日下午3点多就有100多名乐迷登记了相关信息,丢失的东西五花八门。

这和我们往日想象的似乎不太一样,这种不分贵贱地偷,给人一种漫无目的的又无所不可的感觉,这恰好说明偷盗者可能并非职业惯偷,那么问题随之而来,到底是哪些人在偷,又为什么要偷?有网友称,离开营地时,看到很多人开着三轮车、电瓶车围在营地外,车上都装着物品。这种一视同仁地下手,雁过留痕般地摸毛,不禁让人追问,这些人到底出于什么目的?

针对这些偷盗问题,3日晚,中原迷笛音乐节组委会通过官方微博发布通报称,“南阳市公安局及卧龙区公安分局已成立了专案组,全力侦破。5日上午,组委会再次发布通报称,部分盗窃者已被抓获,追回部分财物。

如此迅速反应,说明南阳对此事极

为重视。这种重视,也体现在音乐节筹备和举办期间。据报道,9月21日,南阳市召开了“2023中原迷笛音乐节”筹备工作推进会。9月29日,市领导就南阳火车站迎接全国各地乐迷朋友。次日下午,对音乐节期间交通运输保障服务工作提出具体要求,表示“全市人民将尽最大努力为大家做好各项服务保障”。

只是那些猖獗的偷盗者,偏偏成了各项服务保障的“漏网之鱼”。无论如何,问题终究要解决,城市始终要发展,音乐节也不会让南阳白忙一场,偷盗事件或可成为一个改善城市治理的契机。纵观近年,南阳的努力用心有目共睹。年初的南阳市两会上,“南阳挣钱襄阳消费”的思考出圈;4月底,南阳又提出向淄博学习;如今的中秋国庆长假,这里上演着热闹的中原迷笛音乐节……

思考与行动背后,是当地的进取之心,其初衷也是希望通过活动为城市赋能。但城市治理是个系统工程,想通过活动升级城市形象,如若不能全盘协调,一个极小的问题都可能引发大的负面,多管齐下、细致入微、内修外治,才能实现活动与城市的正相关效应。

就像在筹备工作会上提出的,“把举办中原迷笛音乐节当做检验城市建设管理水平、文明成色的一次考验,当做提升接待服务能力和加速文旅融合的重要机遇”。以如此心态看待这次音乐节,就不会在错失良机的心态中沉沦,而是抬起头看到其考验了城市的能力,找到了城市的软肋。

找到短板才能补齐短板,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南阳不如以迷笛音乐节为突破口,正面应对舆情,及时公布案情,让无视法律的偷盗者付出代价,让城市治理者直面并破解发展难题,让南阳真正像这次活动所宣传的那样,值得“三顾”。

(文图据《成都商报》)